

## “快闪”与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实践

DOI:10.16034/j.cnki.10-1318/c.2021.01.010

主持人 杨增崇[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思想政治教育是时代感、创造性和艺术性极强的实践活动,需要充分贴近教育对象的生活实际并关注新载体新形式,才能做到与时俱进。近年来,《我和我的祖国》系列“快闪”活动在重大节庆期间的蓬勃兴起引发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思想政治教育学界也注意到其承载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互联网+”时代,“快闪”活动具有天然的人际亲近性与实现的便捷性,“快闪”作为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契合青年人个性化认知行为。“快闪”作为一种互联网嵌入青年群体日常生活的别样艺术表达形式,其线上线下链接、时间空间聚合、形式动感时尚、参与便捷简单等特点契合了当代青年的实际,成为当代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兴形式。“快闪”的兴起与当代青年群体性特点之间有什么内在联系,如何利用“快闪”活动来推动新时代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创新,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加以探讨。本期刊发的三篇文章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快闪”与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相关关系,有助于深化对上述问题的认识。

DOI:10.16034/j.cnki.10-1318/c.2021.01.009

## 从适应到超越:“互联网+”时代 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创新 ——基于《我和我的祖国》网络“快闪”的分析

■ 杨增崇 祝大勇

(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875;河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北保定071000)

**【摘要】**发端于互联网的“快闪”,具有新颖性、平等参与性、个体主义倾向等网络本质属性,因而受到生而网络的青年人喜爱。新中国成立70周年前后,青年大学生创造性表达对党和国家高度的政治认同,《我和我的祖国》系列“快闪”活动火遍全国各地,将网络“快闪”赋予了教育意义,成为融合线上线下实现家国情怀的确认、创新思想政治强化教育活动的形式;同时这种新形式也

收稿日期:2020-10-20

作者简介:杨增崇,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思潮;

祝大勇,河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7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理论及其分析方法应用研究”(课题编号:17CKS035)、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协同创新中心(北京师范大学)项目“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教育宣传研究”、河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科研究重点项目“全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研究”(课题编号:SD20107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超越了互联网意识形态属性,从互联网无厘头式的解构转为对主流价值观认同的建构,由去秩序化的自发参与转变为有秩序的设计组织,由宣泄式的个体情感释放上升到审美层面的集体艺术表达等。“快闪”这种新形式启示青年思想政治教育既要适应和运用互联网思维,同时又不拘囿于互联网的意识形态属性,才能调动和激活青年参与热情,实现超越式创新与发展。

【关键词】“快闪” “互联网+”时代 意识形态属性 思想政治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sup>[1]</sup>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思想政治教育怎样创新活动载体,生成新的活动形态,既能适应并贴近青年,又能超越互联网自身的局限性,赋予其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形成创造性转化,这是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我和我的祖国》(以下简称《祖国》)系列“快闪”活动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分析案例,思想政治教育活动通过“快闪”活动,达到了爱国主义教育目的。本文以《祖国》“快闪”活动为例,尝试进行分析。

## 一、“快闪”活动受青年喜爱的特质及其意识形态属性

“快闪”起源于21世纪初的美国,是“快闪影片”或“快闪行动”的简称,作为一种短暂的街头行为艺术逐渐流行开来。“快闪”活动往往发起于网络,报名参与者相约在确定的时间和地点,以出人意料的同时歌舞表演或其他行为方式引起关注,活动结束后迅速离开,完成“快闪”活动的基本过程。“快闪”的发起初衷纯粹是基于互联网的搞笑或是膜拜纪念等行为艺术,其主要的特点是无组织而有约定、只有发起者没有组织者、成员均来自网络而互不相识。“快闪”逐渐跨越国界进入中国,以多样化的形式在各地发起上演。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现象,能够获得广泛的年轻受众群体欢迎,必然有其丰富而深刻的内涵,使青年人从中获得心理、情感和社会参与的多重满足感<sup>[2]</sup>。

首先,“快闪”满足了当代青年更加注重个性化自我表达的需求。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使青年在物质生活方面相对无忧,更加注重精神层面的创造和表达,更加追求个性的自由张扬、与众不同甚至是标新立异,希望能够通过个性化、非主流、新鲜前卫的创意表达吸引注意、寻求关注,在炫耀的心理得到充分满足中获得存在感。而“快闪”作为一种新近的舶来品,因其创意新奇甚至略带大胆任性、轻松诙谐却又无伤大雅、自发参与又能进行组织化群体表达等特点,深度契合了“互联网+”时代的青年个性化特征。

其次,“快闪”满足了熟练运用互联网思维的当代青年社会参与需要。作为网络的原住民,当代青年生活、社交、学习等都深深打上了互联网印记,在获得互联网所带来的巨大便利性的同时,交往的虚拟化也带来了青年社会参与的困境,呈现出线上熟练、线下生疏的不均衡状况。精力充沛、热情活跃的青年事实上渴望真实的、面对面的参与和交流,而“快闪”活动通过网络发起,互不认识的年轻人经过简单排练后,在确定的时间地点完成一次街头行人身边的“艺术景观”。在这个过程中,青年学生体验到从线上回到线下完成现实任务的喜悦与成功,它没有完全剥离互联网思维,却在现实场景中产生反响,满足了互联网时代青年社会参与的部分需求。

最后,“快闪”满足了面临外部压力而内心焦虑的当代青年释放心理压力的需要。当代青年身处不断加快的现代社会节奏之中,面临着人际交往、学习考核、就业发展等压力,经常处于焦虑状态,然而释放心理压力、宣泄负面情感的渠道却并不畅通。“快闪”因其参与者多为陌生

人,由此带来情绪释放的安全感,而通过与陌生人形成半组织化集体进行艺术化的演出呈现,制造和分享快乐,是创造性释放和宣泄,所获得的存在感和满足感更加真实深刻。

当今的“快闪”发端于网络,互联网的本质属性自然会传导给“快闪”活动。应当引起重视的是,互联网并不是纯粹的技术手段,它兼具技术和意识形态双重属性。作为人类理性设计的产物,互联网在设计的过程中一定被嵌入了某种价值,设计完成之后这些被嵌入的价值观念便会发挥作用,而这些价值观念可以从政治层面进行理解,也就是说互联网是具有政治属性的<sup>[3]</sup>,“互联网内嵌着像自由、共同体、平等、利他主义和民主等价值”<sup>[4]</sup>。最初的“快闪”活动之所以能够带来部分青年参与者的满足感,恰恰是实现了互联网意识形态属性的诉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去中心化。一般意义上的网络“快闪”只有发起者没有领导者,参与者相约确定时间地点做出令人意外的“无厘头”活动。美国作家詹森在《现代科学故事》一书中形容“快闪”活动为:一瞬间聚集的陌生人,像蚂蚁群一样在无组织、无领袖的状态下,做出“不用思想”的交互活动<sup>[5]</sup>。而未经申报审核的公共场所聚集活动,也挑战着基本的公共安全秩序,延伸着来自网络的解构权威性、去秩序化特点。第二,自由平等的参与性。通过网络报名“快闪”活动的参与者来自方方面面,以青年人居多,无论身份、性别、家庭背景都可以参与,成员地位平等,沟通方式简单直接,参与或退出完全自发自愿。第三,个体主义的倾向。网络“快闪”活动虽然参与人数众多,但并没有构成一般社会学意义上的“群体”,相互之间关系松散,也没有形成统一的群体精神和集体心理<sup>[6]</sup>。互联网意识形态属性影响着“快闪”,“快闪”又强化着青年参与者的意识形态感知。正如约翰·汤森所言,大众传媒“在现实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在为人们编织着信仰、价值和集体认同。……简而言之,大众媒介已成为支配意识形态的核心体系”<sup>[7]</sup>。第四,形式新颖。“快闪”以突然、群聚和惊艳之效果往往即时性地引发旁人关注,形成瞬时性群聚效应,往往以高雅的艺术形式和创造技法引起人们的心理共鸣和情感体验。《我和我的祖国》“快闪”中往往还加入了知名演艺人员和社会名人,熟悉而动人的旋律和深厚的爱国情感闪现于相对陌生的群人情景里,更容易引起周围行人的驻足观赏和即兴参与。“快闪”作为一种新颖的非正式性艺术表达形式,可以在感染人、激励人、教育人和熏陶人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综上所述,原始的“快闪”活动虽然受青年喜爱,但带有鲜明的互联网意识形态属性,这引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思考:如何在创新设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既要熟练运用互联网思维,又能进行创造性升级转化,从而实现对其自带消极性意识形态因素的抑制,达到批判性超越的目的。2019年前后,在全国各地高校兴起的《祖国》系列“快闪”活动提供了这样的成功范例。

## 二、《祖国》系列“快闪”活动的设计优化及其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2019年春节期间,中央电视台推出了《祖国》系列“快闪”活动,迅速火遍全国,许多镜头得到全网转发,几分钟的歌舞演绎让人们从过年团聚的温暖幸福感迅速升华到对祖国的自豪感,让人感动,催人奋进,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19年正值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全国多所高校青年学生在国庆节前后推出了《祖国》系列“快闪”活动,点燃了师生的爱国热情,唱响了主旋律,传递了正能量。《祖国》系列“快闪”既充分运用了互联网思维,延续了网络发起的主流操作,满足了青年在“互联网+”时代的存在和表达需要,又实现了对原始“快闪”活动的引导性超越,对其局限和问题进行了升级再造,抑制了互联网自带的意识形态属性,使主流意识形态得到确认和强化。

从“快闪”活动的发起组织具体操作环节看,《祖国》系列“快闪”活动的主要改进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同样适应“互联网+”时代特征,熟练运用互联网思维,融合了线上与线下、虚

拟与现实,使之顺应青年网络使用偏好,但环节流程更加精致完善,尤其“快闪”活动视频通过主流全媒体渠道进行广泛传播,使无论参与者还是在屏幕前观看的人同样产生强烈的情感认同。二是同样是自发参与,但活动主题更加鲜明,高扬爱国主义的主旋律,由衷抒发对祖国的热爱和自豪之情。三是同样是在公共场合出其不意地亮相,但参与更加有序规范,在场地选择、场景调度、人员排练等方面设计更加精心,活动效果更加追求艺术审美的升华与情感的共鸣,引发路人的共同参与而不单纯是做猎奇式的旁观。综上,《祖国》系列“快闪”活动让青年创造性地表达了对党和国家高度的政治认同和情感认同,从而使网络“快闪”活动被赋予了积极向上的教育意义,成为融合线上线下、实现家国情怀的确认。而在这个过程中,特别关键的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的“赋值”,充分利用了互联网新技术性特征,从而抑制了互联网的意识形态属性可能给青年学生带来的消极影响,实现了超越式的创新发展。

从最终效果上看,《祖国》系列“快闪”活动对这项具有典型互联网时代特征的行为艺术进行了建设性重构,是当前非常典型的一项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性创新的过程。一是实现了从互联网“无厘头”式的解构转而对主流价值积极认同的建构。原初传入的“快闪”带有明显的互联网去权威化特点,解构权威、嘲讽现实,主流价值观念受叛逆式的拒斥,使网络呈现一种颠覆式“狂欢”的情境特征<sup>[8]</sup>。而“快闪”活动是这种狂欢的现实版本,将互联网意识形态迁移到了现实场景。《祖国》系列“快闪”活动的成功在于,它准确把握住了当前青年一代政治心态和精神面貌的积极变化,顺势而为引导建构取代解构。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随着国家实力增强,青年学生越来越意识到国家发展必须要有统一的领导核心,只有国家强大才能为个人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保障,个人和祖国的辩证关系在歌曲中得到自然的表达和确认,爱国主义的主流价值观得到巩固和加强。二是实现了从去秩序化的自发参与转变为有秩序性的设计策划。“快闪”最初上演常常是在熙攘的街头或者市中心,网上相约的自发参与者突然涌现,打断现有秩序,同时进行喊口号、拍巴掌等动作,事实上带来的是公共秩序的干扰,有人将之描述为“无政府主义者则将它视为科技时代的新兴‘教派’”<sup>[9]</sup>,但实质是互联网时代带有社会动员性质的公众集会,而这种社会动员往往冲破现行秩序规范。而《祖国》系列“快闪”活动多发生在校园环境中,发生在公共场所的同主题“快闪”活动也往往事前有通报协调,避免出现干扰社会秩序之嫌,虽同样多由青年学生自己发起组织,但更注重秩序化、仪式化的表达,通过前期排演以引导有秩序的参与,生成出“快闪”活动凝重的仪式感,使参与者“在自由和秩序之间达到一种平衡,更有意识地去感觉、珍惜生活中的特殊时刻”<sup>[10]</sup>。三是从个体无聊小情绪的宣泄提升到进行审美层面的集体艺术表达,从获得关注的个人心理满足提升到对家国情怀的强化和抒发。互联网强调个体自由的价值属性使最初的街头“快闪”活动停留在个体小众无聊情绪的宣泄,它并不注重内涵意义,只是强调个体吵闹表达,体现为“表达什么不关心,关键是我在表达”。有人据此甚至认为,这种“快闪”只是新兴科技带来的个别的毫无意义的瞎闹,而这种个体肆意宣泄的精神源头可以追溯到西方个人主义文化内核,奉行个人优先于社会、小我凌驾于大我之上。与之相反,《祖国》系列“快闪”活动从始至终彰显着浓厚的集体主义精神和崇高的家国情怀,青年学生踊跃参与,用较高的艺术水准表达对祖国的热爱,而在经由全媒体二次传播的过程中,更是点燃了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如清华大学组织的《祖国》“快闪”活动,在新媒体平台上发布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最初的“快闪”自带互联网的去权威化属性,解构主流价值。然而,《祖国》系列“快闪”活动却实现了对国家高度的政治认同和情感认同,促进了青年学生向主流价值观的回归。“快闪”活动使互联网原有的意识形态属性得到抑制,主流价值观的传播便可以借助网络得以实现。

### 三、“互联网+”时代青年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创新发展的启示

《祖国》系列“快闪”活动的成功意味着网络“快闪”活动的华丽转身,但它并不是自发实现这种升级转化的。事实上,在《祖国》系列“快闪”活动全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都进行了积极的介入,在辩证分析互联网技术意识形态属性同时,从策略、内容和载体的创新出发,寻找和建构满足青年需求的“互联网+”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形式,其中体现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对现实政治生活的敏锐感知力、设置活动议题赋予价值的引导力、精心设计内容增加活动的吸引力、整合媒介载体扩大传播的影响力,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充分适应“互联网+”时代青年生活方式和情感表达的特点,同时抑制和超越了其自带的互联网意识形态属性消极影响,弘扬了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主旋律。

《祖国》系列“快闪”活动引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对“互联网+”时代活动育人创新发展的深入思考。活动是思想政治教育现实化的重要载体。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的活动载体,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为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的所设计开展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sup>[11]</sup>。设计和开展恰当的活动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付诸实践,教育对象践行价值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的过程,其意义在于实现教育与自我教育的有机统一。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网络日渐成为青年不可或缺的生活工具和生活场景,信息获取、社会交往、休闲娱乐以及日常消费深度嵌入网络。面临全新的网络技术应用而带来的青年生存方式的变化,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载体实现从适应到超越互联网的创新发展,面临着两大矛盾问题。其一,互联网虚拟化环境中身份匿名、个性释放的自由诉求<sup>[12]</sup>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塑造个体形成良好品德、遵从确定社会规范社会秩序的本质之间存在矛盾。在现实工作中,存在着回避、无视互联网的倾向,口头上重视实践中轻视,并没有真正回应互联网时代青年的成长需求和困惑。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设计过程中沿用传统经验思路,未能对互联网思维进行充分理解和运用,将青年们的个性释放简单化视作教育的对手、问题,未能引导学生认识到个人发展与国家发展的辩证关系。学生误认为互联网展现个性就是个人发展的错误认知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引导,造成的结果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与青年生存生活出现两套规则、两套话语体系: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自我感觉良好,而学生在网络上用另外一套规则另行评价。其二,互联网技术便利化带来的工具理性夸大异化与思想政治教育追求人的价值理性实现之间存在矛盾。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互联网在给青年学生带来学习上极大便利的同时,青年也产生了网络依赖甚至网络异化,脱离现实生活进入想象的共同体,不能回归日常生活形成感知、升华情感和磨炼意志,影响科学理性信仰的形成。这样,互联网已经不再是服务于人的技术,反而成为支配人的主宰。而网络天生自带的去中心化、去权威化、去秩序化等意识形态特质因而获得现实的存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设计与发展就是要把青年从这种错误的技术应用中解放出来,运用互联网生成现实价值理性。总之,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设计思路不完全剥离网络,但又不受制于网络,实现线上线下的融合式创新发展,使活动形式更吸引人、活动内容更打动人、活动体验更感染人。实质上,上述两对矛盾本质上都是互联网技术形态与意识形态双重属性与思想政治教育形式与内容两个方面的矛盾,思想政治教育要解决形式上回避运用互联网工具的问题,运用互联网思维对教育活动进行时尚包装,同时要在内容上实现对互联网意识形态属性的超越,实现对互联网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抑制,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性引导。

2019年前后《祖国》系列“快闪”活动的推出,很好地解决了这两个基本困惑和矛盾,在活动形式设计上运用互联网思维把握现实与虚拟的关系;在活动内容考虑上,充分反映了特定

间节点的政治情绪表达,对“互联网+”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创新具有启示意义。

第一,活动载体设计运用把握好教育时间点。《祖国》系列“快闪”活动很好地把握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前后网上网下饱满高昂的爱国主义情绪,这种情绪在当下中外治理效果比较下获得了更坚实的自信基础。由此上升到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设计一般性规律就需要注意,各种法定节日、传统节日、革命领袖、民族英雄等历史人物诞辰和逝世纪念日都蕴藏着宝贵的思想道德教育资源,是集中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主题活动的重要时间节点和良好契机。在这个时间点前后,要有意识地注意关注网络舆情动态,有节奏地在网络上为活动开展进行预热铺垫,及时在线上发现问题和不良情绪,及时捕捉和引导积极情绪正能量的释放,这就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具有敏锐的现实感知力和熟练的网络运用能力。

第二,活动载体设计赋予明确的教育目的。《祖国》系列“快闪”活动具有爱国主义的鲜明主题,明确了个人和祖国不可分割的紧密关系,大大增强了青年学生的爱国情怀,实现了情感的升华,使“快闪”进入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范畴。“互联网+”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应当明确教育的针对性,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引导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警惕互联网极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民粹主义等意识形态属性的现实化传播,防止互联网时代泛娱乐化倾向导致青年信仰缺失等现象发生,用主流价值为互联网强化赋值,形式为我所用,价值由我主导。这就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能够精准地设置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议题,赋予活动内在价值的引导力、激活力。

第三,充分整合互联网时代媒介,调动和发挥受教育者的主体性。《祖国》系列“快闪”活动很好地实现了线上线下、传统与新媒介融合,充分调动了熟悉互联网操作的青年的积极性,使他们从线上到线下、又从线下到线上,担纲主角绽放光芒。所以,互联网时代设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需要充分尊重熟练运用互联网的青年学生,发挥他们在受教育过程中的主体性作用,实现教育与自我教育的统一。这就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不能将互联网技术形态视作洪水猛兽,因而也就不能把生而网络的教育对象青年学生放置在教育的对立面,应当充分借助网络推动他们成为自我教育的主体,进行自我组织、集体参与、展示才华,实现正向的网络社会化动员。要充分运用互联网思维,实现教育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祖国》系列“快闪”活动做到了“运用艺术形式和新媒体,以理服人、以文化人、以情感人,生动传播爱国主义精神,唱响爱国主义主旋律”<sup>[13]</sup>,在内容和形式上都非常具有吸引力。“互联网+”时代,“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如果不能把政治性、理论性、系统性的教育内容转化成具体性、丰富性、变化性、互动性、渗透性的教育内容的话,就不能被网络受众所接受,最后就会被网络世界所拒绝”<sup>[14]</sup>。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形态创新发展,需要在网络语境中熟练运用互联网思维,内容选择和呈现充分体现网络时代的话语特点,创新内容表达的言说方式,营造美好的仪式化的氛围,确保贯穿活动中的精神价值拥有青年可以感到的主题、能够提取的价值导向和能够识别的规范意义<sup>[15]</sup>,从而有助于参与主体产生正向的心理暗示和激励共情的作用。

第四,互联网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设计应当结合具体高校实际情况,避免“活动崇拜”,将活动搞成跟风模仿。《祖国》系列“快闪”活动的成功还在于各个高校依据自身实际情况设置场景具体展开,没有搞简单复制“一窝风”。“活动崇拜是一种过度重视活动的倾向,它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将活动视为万能的武器,二是过分追求活动的数量和规模,忽略活动的质量。”<sup>[16]</sup>活动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载体,举办活动是为了更好地表达情感,达到更好的教育效果。然而,在个别高校出现了为了活动而活动的情况,这恰恰是与基于互联网的用户思维、简约思维和极致思维相违背的<sup>[17]</sup>,背离了育人的初衷,没有结合地方、院校、专业以及学生的具体情况,以至于在学生的中心,虽然举办活动了,但仅仅是一种形式,既没有尊重受教育者,使其看不到

活动背后所隐含的情感价值,同时也会造成活动资源的浪费和活动信任的消耗,削弱了青年学生参加活动的积极性,导致出现事倍功半的结果。

《祖国》系列“快闪”活动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案例,它启示“互联网+”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载体的创新发展,既要适应互联网技术形态带来的变化,熟练运用互联网思维,又要超越互联网意识形态属性的限制,进行必要的价值引导,最终实现互联网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1+1>2”的现实效果。

### [ 参 考 文 献 ]

- [1]《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 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载《人民日报》2016年12月9日。
- [2]熊剑峰《网络快闪的社会文化寓意和反思借鉴》,载《思想教育研究》2019年第6期。
- [3]程同顺 张文君《互联网技术的政治属性与意识形态传播》,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
- [4]安德鲁·查德威克《互联网政治学:国家、公民与新传播技术》,任孟山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年版,第23页。
- [5]黎 然《快闪行动“无厘头”之集体版》,载《中国新闻周刊》2003年第35期。
- [6]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陈天群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3-23页。
- [7]托德·吉特林《新左派运动的媒介镜像》,张 锐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第9页。
- [8]季 欣《“反讽”的狂欢——中国青年网民“网络造句”现象的文化心理研究》,载《中国青年研究》2013年第9期。
- [9]陶建钟《冷静与思索后的快闪》,载《人民网》,http://theory.people.com.cn/GB/40557/51611/51613/3609595.html. 2005-08-11
- [10]洛蕾利斯·辛格霍夫《我们为什么需要仪式》,刘永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 [11]《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编写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第267页。
- [12]张 波 陈 超等《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实现的矛盾与路径——基于互联网意识形态属性》,载《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 [13]《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大力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 为实现中国梦提供精神支柱》,载《人民日报》2015年12月31日。
- [14]胡树祥《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3页。
- [15]屈利明 梅小青《仪式感在当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意义、困境与重建》,载《黑龙江高教研究》2019年第10期。
- [16]杨德霞《警惕活动崇拜》,载《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07年第1期。
- [17]赵大伟《互联网思维——独孤九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年版,第25-26页。

(责任编辑:韩永涛)